

丽珍的妹夫，按理是一家人，不会记错。但因潘光迥夫人名字由“张玉珍”后改名为“张郁真”，妻姐张霭珍（校友王世圻夫人）后改名为“张霭真”（又名张霭贞）的缘故，他也将何林一夫人名字“张丽珍”误记为“张丽真”。又如浦薛凤回忆的“张惠珍”一说，显然也系记忆失误。

虽然未查到最先在《清华风物志》上明确“张慧真”说的来源，推测同样应为校友回忆而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清华校友工作一度中断。1979年清华大学决

定恢复校庆纪念，校友工作也随之恢复，海内外校友与母校的联系日益频繁。每逢校庆日或校友们聚会时，唱校歌、回忆母校时光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如果不是校友们的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校史编写组的老师不太可能得到何林一夫人为“张慧珍”这样一种说法的。另外，张丽珍家庭姐妹众多且优秀，有一定的知名度，也会导致校友们张冠李戴。如以上所举“张霭贞”“张慧珍”，并非与张丽珍无关，而是她的两个妹妹。

## 我有青云志 何惧星汉遥

### ——1978年以后的清华大学民乐队

○刘沫（1997级水利）

清华大学民乐队始建于1924年，是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中的一支历史悠久、队风优良、建制齐全、非艺术院校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2013年荣膺教育部颁发的“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团民族管弦乐团”称号。民乐队百年变革中，清华民乐人紧跟时代脉搏，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和提高民乐演奏技艺，在民族音乐熏陶和学生民乐团体建设中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全面锻炼能力，成为清华大学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三支代表队”中最具特色的队伍之一。

#### 翩翩佳少年，俊气欲无敌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民乐队，乃至其他代表队在全国高校中都是比较稀少的存在。

清华大学1946年成立的音乐室，在很

长时间里，在中国的非艺术类院校中都是独一无二的。1948年，音乐室聘请西南联大文学院毕业生王震寰来校担任教师，开设民乐的理论型课堂教学并指导学生民乐队，自此，王震寰老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耕耘了整整40年。“文革”结束后，当音乐学院都还在渐渐恢复正常教学和工作的时候，在音乐室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学生民乐队1978年前后就已经复建了。在王震寰老师的指导下，民乐队迅速恢复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规模。

1978年时，王震寰老师已经60岁了，但是依然耐心慈祥，不但选拔新队员、教授二胡演奏、指挥乐队，还非常关心队员的生活，深受队员们的爱戴。王老师近视达两千多度，带着中间有小孔的极厚的镜片，每次民乐队外出演出时，队长都要委派专门的队员来照顾王老师的安全，负

## □ 史料一页

责这项工作同学要紧紧挽住王老师的一只胳膊，在必要时告诉他“上台阶，下台阶”，一刻都不能松开。

有必要说明的是，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民族乐队建设力度是空前的，全国各地很多重要城市都开始设立民乐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和济南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和“前卫”民族乐队。“京畿文化圈”民乐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民族管弦乐队的所谓“彭修文模式”。相比之前的民族乐队，以“彭修文模式”建立的民族乐队更成熟、均衡，有更完备的乐队建制，培养了大众化现代民乐欣赏品味。

身处“京畿文化圈”，“文革”后复建的清华大学学生民乐队跳过了过渡期，直接进入“彭修文模式”，甚至彭修文先生本人几次来清华直接指导民乐队。“文革”后的民乐队乐器配置已经十分不同：扬琴变成了4排码子，低音声部直接使用西洋乐的大提琴和贝斯，弹拨声部里不再

出现三弦，小阮被柳琴代替，板胡从拉弦声部消失等。除此之外，队内的个别队员还有机会得到著名琵琶演奏家何树凤、刘德海，二胡演奏家张方明、闵惠芬等名家的指导。

由于“文革”时期全国中小学生的校外音乐教育几乎全部停止，当时民乐队的队员中有演奏基础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家学渊源，经王震寰老师考核通过后入队。因为人数不足，当时民乐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声部不全，为了某个曲目，很多队员只能临时学习某样乐器，以至于民乐队不少队员都能身兼三四个声部，有些乐器只能摸索着自学。

### 专业指导教师

1985年，由于王震寰老师年事已高，杭州姑娘、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俞玲玲老师进入清华大学担任民乐队指导教师。俞玲玲师从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技艺精湛、认真严格、爽朗热情，深受学生喜爱，从此拉开了民乐队由专业教师长期指导的序幕。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吕建强老师担任民乐队指导教师，同时乐队还邀请了中国音乐学院马彪、中国民族乐团秦鹏章、中国电影乐团楚世及等专家先后担任特聘指挥，使得民乐队的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1994年10月，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韵我华夏，爱我中华”专场音乐会，时任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副团长的张大森先生担任特聘指挥，开启了长达25年的“张大森时代”。民乐队成为首支进入北京音乐厅演奏的业余民乐队伍，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被《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争相报道，从此民乐队迈上了新台



1979年，王震寰老师（前排中）与民乐队队员合影

阶，发展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现代民族管弦乐团，一直是高校学生民乐团体的翘楚，在历次民乐比赛和汇演中均名列前茅。

张大森先生用他的人格魅力、敬业专业、睿智诙谐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与尊敬，他的离去也让每一个队员感到无比的痛心和遗憾。

### 特长生

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第一批在音乐学院接受系统音乐教育的毕业生开始走向工作岗位，他们中很多人承担起青少年艺术教育责任，带出了第一批从小在课外接受现代、系统音乐训练的学生。因此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非艺术院校的大学校园里，学业优秀、音乐素养好、演奏技巧高的大学生慢慢出现了，各大学艺术社团开始全面开花，技术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之相对应的，各高校开始逐渐建立起从具有艺术特长的中学生中选拔合适自己学校的学生的制度，也就是艺术特长生选拔制度。

1987年，清华大学率先招收艺术特长生，用降分的方式录取品学兼优、具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旨在带动校园文化建设。1989年初，清华大学举办首届“清华大学全国中学生文化艺术冬令营”，从中挑选艺术特长生。此后一直到2022年，每年年初都举行艺术冬令营（后来更名为“高水平艺术团选拔测试”），进行特长生选拔。在清华大学的带动下，到2009年已有58所高校招收艺术特长生。清华大学民乐队于1989年迎来第一批特长生杨玲（二胡）和周曼琳（扬琴）。

由于清华大学率先施行艺术特长生选

拔和招收制度，在90年代中期以前，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水平在众高校艺术团中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1993年5月，首届首都高校大学生民乐汇演，清华大学民乐队囊括了所有的一、二等奖和半数的三等奖。此后各大学开始纷纷效仿，招收艺术特长生，例如北京大学就在1994年重新组建了民乐团。

1993年，清华大学在音乐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师资和设备力量都有了新的发展。同年8月，清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也是在1993年，民乐队创建了队刊《阳春白雪》，到2016年停刊，前后共刊印20期，跨度23年。

1994年1月底的冬训中，在已经招收了7名高水平特长生的条件下，《长城随想曲》的排练成型，标志着民乐队开始成为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同年4月25日，在大礼堂举办了杨玲同学本科毕业独奏音乐会。也是在同年，杨玲同学当选为清华大学第一届“清华十杰”。

1996年，1991级的二胡特长生陈肯创作了民族管弦乐作品《荷塘月色》，由张大森先生配器，先后在1999年和2005年民乐队参加北京市大学生艺术节和首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时演奏，均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二首由清华人自己创作的民族管弦乐《荷塘月色》。第一首民族管弦乐《荷塘月色》是由王震寰老师在1980年创作的，曾一度成为民乐队的保留曲目，在校内外多次演出，如1981年首都大学生文艺汇演。

从1989年起至2023年教育部下发《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取消高校选拔艺术特长生制度

为止，民乐队共招收特长生163人，占同期民乐队总人数的21%。特长生们除了因其本身的高水平演奏技巧，扩大了选曲范围和提高了表演稳定性之外，作为民乐队“师傅带徒弟”优良传统中的“师傅”，发扬了奉献精神，对乐队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民乐队的管理与传承

### 一、师徒制/学员班

独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即使有演奏基础的同学作为骨干，民乐社团也必须每年吸纳很多新队员，这些经过考核入队的新队员很多并没有学习过器乐演奏。

在民乐队的历史上，经常聘请民乐演奏家指导乐队队员，聘请演奏家的渠道经常跟指挥的背景直接相关。例如，王震寰老师在世时，会挑选民乐队骨干队员请中国音乐学院的名家指导演奏；楚世及先生担任指挥期间，会请中国电影乐团民乐团的演奏家们辅导清华民乐团的各声部；张大森先生执棒期间，每逢遇到重要演出或者比较难的新曲目，会邀请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老师们前来指导；在袁贝先生接任

指挥后，来清华进行教学指导的老师们换成了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

但更多的情况是，由队内有演奏基础的队员教授新队员，这个方法早在1919年的清华“国声社”就开始采用了，五六十年代也沿用此法。在民乐队有了特长生以后，教学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特长生和乐队老生们的头上。

“师傅”带“徒弟”传统，给乐队带来的好处至少有三点。第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困扰乐队最大的难题——队员更迭。学校乐团跟专业乐团最大的差别就是学校乐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刚刚培养起一批合格的乐手，他们就毕业了。而让这些有经验、有技术的老队员或者特长生们当“师傅”，既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新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足以达到参加大队排练的水平。第二，师傅和徒弟之间的纽带比起普通队员间的关系更加牢靠，增加了乐队的凝聚力。第三，当了“师傅”的老生和特长生们，教学相长，自己在技巧和曲目的领悟上也得到了提高。

### 二、集中班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集中班的传统要追溯到1958年学校统一管理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分别优选骨干队员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训练的制度。这些被集中的队员所在地方被称为“集中班”。

蒋南翔校长认为，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应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这些年来



2012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赛前预演

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生自己的组织能力很强，进入到集中班的各队队委，经过工作的锻炼，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集中班也是个经常被戏称为“贼船”的地方，能将集中班视为“贼船”的集中队员，都是有情怀、无私奉献的人。集中班是艺术团各个代表队的核心，决定了各代表队的凝聚力。

民乐队的集中班与别的代表队集中班稍有不同。1978年，王震寰老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并且患有严重的眼疾，民乐队集中班的队委们主动承担起责任，并将这种作风一届一届传承下来，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演出或比赛的洗礼，磨炼出一届又一届的优秀队委，队内团结一心，队外大放光彩。

1991年以后，民乐队代表清华大学3次参加全国大赛，均荣获一等奖；7次参加北京市大学生艺术节/艺术展演/音乐节，均荣获一等奖或金奖。

## 结语

民乐是连接世界华人的纽带，民乐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体现。香港回归前夕，清华大学民乐队在1995年随学校领导赴香港演出；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民乐队全员在澳门政府门口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回归的专场演出，寓意深刻。

“文革”后的40多年来，民乐队经历磨炼和辉煌，其中有日常排练的坚持，队委、学员班长、声部长们无私的奉献，演出时在乐曲中与大家共同感受灵魂的颤抖，也有准备大赛的艰辛，得奖后的喜悦，假期跟队友们出游的欢乐，还有参加文体活动的温馨。对大多数民乐队员来说，民乐队这个集体，提供的是一份归属

感，是大家共同战斗过、欢乐过、幸福过的地方。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现在已经进入到“现代时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姚亚平在《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百年追求》中这样描述：“它更为磅礴，音响更为强烈和具有冲击力……在传统乐队中挖掘出更多样、更丰富的新声音的可能，它在技术上更复杂，配器更丰富，音响更现代。”这就意味着民乐队面临着新的挑战。

社会民众也对民乐团体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新的文化使命是：“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不仅是继续推动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的政治支撑，也是民众呼声的体现，近年来央视各大联欢晚会中民乐的元素越来越多。

此外，高校停止招收特长生以后，维持高水平艺术社团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在民族管弦乐队建制上已经非常成熟的清华大学民乐队，在近年来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表演风格和表演方式。不但尝试新的曲目，2021年还设计并推出“遇见民乐”系列演出，开展民乐普及活动。

清华大学艺术团，代表了清华学生的精神风貌、清华大学艺术教育的方向，以及清华大学艺术教育的成果。艺术团是建立在团委领导、艺术教育中心指导、艺术团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体制上的。相信在新的形势下，民乐队将和团委、艺教中心共同面对挑战，不断调整，找到适合新形势的发展之路。